

第三章

子学导论

—— 子部的形成

—— 诸子的学理

—— 子部文献的阅读

子学表述的是一个学者的见解、一个学派或者一部分人的共识。这些见解与共识，是从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视角来观察、思考自然、社会与人生现象，并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系统的表达，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资源。我们现在一般多从思想、观念、哲学、文化角度来看待子学，将之视为中华文明的思想结晶和生活经验的汇总。我们阅读诸子的著作，一方面要关注他们的独创性，另一方面要思考他们讨论的学理性，去观察他们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学术的理性判断。

第一节 子部的形成



慕课视频：
百家为何争鸣？

在甲骨文中，“子”的本义是小孩子，后引申为对男子的美称，用以表示身份和地位。古代凡是有道德者、有学问者、有爵位者，皆可以被称为“子”，许多记录诸子言论的书，也多以此来命名。西汉刘向、刘歆在校书过程中编撰《七略》，就将周秦以来许多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书，统编入“诸子略”。在此之后，凡著书立说、自成一家之言者，统称子书，在四部分类法中皆列入子部。相比于经部、史部，子部的内容比较芜杂，所细分的类别也多一些。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再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因分类的标准不尽相同，各类别的书目也在不断变化，体现出不同时代子学思想的演变。

一、九流十家

诸子学说的分野，在于不同学说的视角存在着差异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相同，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合理，便对相类或者相反的学说提出批评。例如《墨子·非儒》就批驳儒家提倡的婚丧之礼，认为有差别的亲亲关系、礼乐活动对于政事、生产有害无益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、下两篇讨论到墨家、杨朱、农家的思想，也是句句尖锐、刀刀带血般的批评，认为墨家的兼爱学说“无父无君”^①，杨朱的贵己观念出于自私，农家的主张是“相率而为伪者也”^②。可见在孟子时期，诸子的学说已经呈现出学理上的差异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中将诸子分为六类：一是墨翟、禽滑厘，肯定了他们非乐、节用、兼爱、节葬等观点，并注意到墨者的墨辩逻辑，他们主张不奢侈、不浪费、不突出等级差别；二是宋钘、尹文，不为世俗牵累，不用外物矫饰，不苛求于人，希望天下安宁，人民生活幸福；三是彭蒙、田骈、慎到，公正不党，平易无私，无思无虑，安时处顺；四是关尹、老聃，探讨道的精微，恬淡自然，柔弱谦和，不伤万物；五是庄周，既能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又能够与俗独处，不遣是非；六是惠

^① 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章句下》，第210页。

^② 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章句上》，第178页。

施，思索万物之理而不厌，以善辩论为名。在庄子后学眼中，不同的学说虽然有境界高下之分，但都着力谈论道术的本源，各有所长。

到了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，也对诸子之学进行了评价：一是它嚣、魏牟，他们的学说主张放纵性情来追求自己的利益；二是陈仲、史鳢，过分压抑自己的欲望，违背人之常情性情；三是墨翟、宋钐，过于追求实用，宣扬兼爱，放弃礼法，会导致社会混乱；四是慎到、田骈，重法轻礼，会让百姓茫然无所从；五是惠施、邓析，热衷于奇谈怪论与诡辩，只能扰乱大家的心智；六是子思、孟轲，只知道法先王而不知具体的治国纲纪。除此之外的其他儒学流派，要么言谈粗疏，要么装模作样，要么毫无理想节操，各有所短。

如果我们对读《庄子·天下》与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，就能够发现诸子学说的分野在战国时期已经壁垒分明，因为立足点不同，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，观点、结论和论证的过程也千差万别。若从道术的层面来看，都是对天下之道的探讨，各有侧重，各种学说只存在方向上的差别，不存在对错之分。若从服务于现实行政的需要来看，用实践检验，则可能只有一种学说最契合当时的现实，荀子便选取了十二位学者进行了批驳，以此证明自己的学说最合理。

在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中，也列举了十家的学说：“老耽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臧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兒良贵后。”其中涉及道家、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等，类似的说法也见于《尸子·广泽》，能以一个字概括诸子学说的主旨，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学理讨论的深入，诸子学说的分野越来越明晰，其学说的核心在比较中得以明确。

入汉之后，淮南王刘安与其门客一起编写的《淮南子》，试图融汇百家学说形成一个直接服务于治国的学理系统。其在《要略》中，分析了兵家权谋、儒家礼乐、墨家节财、管子强国之道、晏子讽谏之法、纵横家游说之术、法家刑名之学、商鞅耕战之策的形成，是源自现实的需求。刘安试图将之融会贯通，使之能“以统天下，理万物，应变化，通殊类”^①，形成适应天下一统形势的治国学说。

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记载父亲司马谈的《论六家要指》，更加客观地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、儒、墨、法、名、道德六家，第一次用“家”的名目来指代不同流派，^②总结了先秦子学的学术思想，对他们学说的优长和缺失进行了客观的分析，认为六家的学说指向不同，但都在试图就如何治理国家进行理念和策略上的探讨，其中阴阳家的顺阴阳之道、儒家的长幼有礼、墨家的强本节用、法家的尊卑有序、名家的循名责实、道德家的因循为用，是百世不得废、不能改的纲纪与法则。这是

① 刘文典：《淮南鸿烈集解·要略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711页。

② 梁启超《司马谈〈论六家要指〉书后》：“庄荀以下论列诸子，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，其隳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，用科学的分类法，厘为若干派，而比较评鹭，自司马谈始也。分类本属至难之业，而学派之分类，则难之又难。后起之学派，对于其先焉者必有所受，而所受恒不限于一家。并时之学派，彼此交光互影，有其相异之部分，则亦必有其相同之部分，故欲严格的取以论理，而薄其类使适当，为事殆不可能也。”《梁启超全集》第16卷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697页。荀子、庄子虽然也使用过“百家”一词，但是没有具体使用“某家”或者“某人家”一说。

从史学家的眼光审视诸子学说的异同，并对其学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。其中的阴阳家结合阴阳、四时而思考天道运行的法则，确立了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天道运行顺序，着眼点在于天道。其余五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人道如何运行：儒家能以尊尊亲亲为礼，墨家能以节葬节用而富国富家，法家能明确职责，名家能循名责实，道家能顺应时势。

汉成帝河平三年（前 26），刘向、刘歆父子受命整理皇室秘藏典籍，他们对图书进行分门别类。西汉去古未远，诸子之书保存很多，他们由此编成了“诸子略”，根据其内容和学理，将之分为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家，共 189 种，计 4324 篇，其中除去小说家，诸子为“九流”。刘歆在每类中胪列当时所存的有关典籍及篇数，每家目录列完后还有总结性的概述，说明某家的渊源、学术特点和后学继承，并兼及判定书之真伪，对容易混淆和误解者加以注释，对诸子学说进行了分派，成为后世诸子学说的基本分类。

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这些分类体现的是汉代学者的学术视野。一是有明显的尊儒色彩，^①把儒家列于诸子之首。二是新列出的杂家，并不是因其内容繁杂，而是“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”，兼容诸家之长，体现出秦汉时期诸子学术融通的倾向。三是按照编书者的工作进行分类，“诸子略”之外的“兵书略”“术数略”“方技略”，实际上也是诸子的著作，但由于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，因此把这三类分别列出。班固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时一仍其旧，没有合并，这三类在后世渐被合并入诸子，成为子学的组成部分。

二、子部目录的分合

晋武帝太康年间，汲郡的一个先秦古墓中出现了大批古书，晋武帝交由秘书整理。以此为契机，荀勖将秘书监中的新旧古书编订了一个目录，是为《中经新簿》。《中经新簿》分为甲乙丙丁四部，改变了此前《七略》的分类方法，将诸子、兵书、兵家、数术合并，作为乙部。其中的佛经并不列入四部之中，只作为附录。南朝梁的李充重新编定秘阁所藏书目，由于所编书目较少，每部之下不再分类，他按照甲经、乙史、丙子、丁集的顺序排列，成为后世四部常用的顺序。

中国目录学上对书目的分类，主要有七分法和四分法，七分法就是仿照《七略》而来的分类法，四分法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或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种。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子部书目，南朝宋王俭的《七志》、梁阮孝绪的《七录》、隋代许善心的《七林》便采用了七部分类法。

其中王俭在元徽元年（473）编过四部书目，但他在私撰的《七志》中，分为如下七类：经典志、诸子志、文翰志、军书志、阴阳志、术艺志、图谱志。其中的经典志收录六艺、小学、史记、杂传，实际上是将经、史合并，文翰志纪诗赋，即集部。其余的五志，基本属于子部。此外另列道经、佛经各一志。

^① 从著述数量上来看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对儒家所录的种数也是最多的。儒家 53 种，道家 37 种，阴阳家 21 种，法家 10 种，名家 7 种，墨家 6 种，纵横家 12 种，杂家 20 种，农家 9 种，小说家 15 种。

阮孝绪的《七录》，则分为经典录、纪传录、子兵录、文集录、术伎录、佛法录、仙道录七录。其中，子兵录收录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、兵十一家，将兵家合并入诸子之中。

唐贞观三年（629），魏征根据隋朝的遗书撰成《经籍志》，采用四部分类，将子部位列经部、史部之后，将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诸子略”“兵书略”“术数略”“方技略”合并，共分为十四类，即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、兵家、天文、历数、五行、医方，使得子部的概念更加明晰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：

一是相对于《七略》中“诸子略”位列第二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继承了李充的做法，将诸子调整到史部之后。一部分原因是南北朝史学的发达，使得史书的数量增加，史学的地位上升，此消彼长，南北朝子书撰述不仅水平有所下降，而且数量远不及经学、史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收录子书的数量仅占全部书目的7%，而《七略》中，诸子的书目几乎占全部书目的1/3，可见魏晋南北朝子学的式微。

二是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不列阴阳家，原先阴阳家的内容并入五行类，尽管内容是十四类中最多的，但五行并不以一个学派出现。一方面是阴阳家学说中最突出的是天人感应说，盛行于西汉，但经过魏晋玄学的理论思辨，这一学理逐渐被削弱；另一方面在南北朝形成的佛教、道教等的宗教思想，替代了阴阳学说中许多有关命书、相书的内容，使得这一时期阴阳五行的书目有所削弱。

三是《隋书·经籍志》新增了医方类。这些医书在《七略》中被列入“方技略”，合并入子部，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医学的发达。《黄帝内经》之后，《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》《脉经》《针灸甲乙经》《肘后备急方》等著述先后出现，使得医学经典不断增加，其科学性、实践性日渐突出，因而单独分类，不再与巫术、方术并列。

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后，四部分类法定于一尊，后代虽有私家著述目录在分类上进行调整，但多数仍是在七分法与四分法之间调和，并没有大的变动。《四库全书》编写时，仍按四部分类法，其中子部分为十四类：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杂家、类书、小说家、释家、道家。相比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新增了艺术、谱录、类书、释家。

《四库全书》中的子部艺术类，下面又分书画之属、琴谱之属、篆刻之属、杂技之属，主要是书法和绘画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没有艺术类，是因为在隋之前的艺术作品不多，艺术理论更是寥寥无几，没有著录的必要。唐代书法、宋代绘画无论在实践上，还是在理论上都很有建树，艺术形式如篆刻、雕塑、歌舞、杂技等纷纷出现，有了分类的必要。

谱录类著录的主要是器用、饮食、工艺农事、草木虫鱼、杂物等。其详细书目的出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史部谱系类的《竹谱》《钱谱》，有的出自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中子部农家类的《鹰经》《相鹤经》，还有的出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子部小说类的《茶经》等。

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，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，便于寻检、征引

的工具书。其博采四部，而且分门别类，便于查找各类资料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各朝各代都有类书的编撰，如唐代徐坚的《初学记》与欧阳询的《艺文类聚》、宋代的《太平御览》、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、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。到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其数量已达到 65 部，并存目 217 部，其数量之巨，为子部第一。

释家收录的都是佛教典籍。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佛教长期不为中国正统学术所接受，即便在《四库全书》中独立成类，也是“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”^①，而不录其他经典。

在《四库全书》的分类中，消失的类目有墨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。这三家都曾是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，其流风余绪尚能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但南北朝时名家仅有 4 部 7 卷，墨家有 3 部 17 卷，纵横家有 2 部 6 卷。从学理上讲，墨家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，号为“儒墨”。不同于儒家注重君子人格的培养，墨家是中下层民众的代言人，其更近于组织纪律严明的侠客组织，在严密组织上超越了国家系统。秦汉一统后，墨家被明显削弱，墨家后学缺少理论体系，墨家著作也很难再成系统。

随着汉代字书《尔雅》《释名》等的出现，名实问题不再成为学者讨论的障碍，名实之辨不再有讨论的必要。南北朝佛教传入，因明学吸收了名家的逻辑，建立一套新的解说系统，名家的议题被解决，学术逻辑被融合，名家的著述也就日渐衰微。

纵横家的学说多是春秋战国诸侯兼并时，游说之士纵横捭阖的策略。随着秦汉政权的统一，纵横家渐渐失去了合纵连横的空间。西汉前期他们尚能回光返照，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，纵横家缺少活动空间。纵横之术是乱世之学，在治世，纵横之术只能被外交家、谋士所继承，缺少用武之地，更不能堂而皇之置于案头，只能逐渐消亡。

这三家典籍日少，思想日竭，都不足以独立成类，《四库全书》便取消了这三个类目而并入杂家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子部目录的变化，体现了诸子学说的发展态势。

三、子学的发展

秦始皇焚书坑儒，烧百家语，诸子之学扫荡无余。汉初广开献书之路，将许多诸子之书充于秘府。相对于先秦子学，两汉的子学并没有呈现出分途发展的趋势。一在于经过了周秦诸子的争鸣，秦汉时期学术思想的总体走向是趋于融合；二在于两汉儒学得到了官方支持，以儒家学说吸收阴阳家、名家、法家、墨家和道家的思想，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，很多诸子学说的发展，是在儒家思想的主流之中涌动潜行的。

汉初黄老之学，是对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会通。黄老学说产生于战国中期，极盛于齐国的稷下学宫，主要代表著作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黄帝四经》。黄老学说假托黄帝的名义，以道家的“道”为学理支撑，以“无为无不为”为理论原则，

^① [清]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45《释家类》，第 1236 页。

吸收了刑、名、兵、阴阳等思想，制定了一套注重因循顺应，强调清静无为的治国学说。相比于道家，黄老学说更务实于行政；相比于法家，黄老学说更强调清静无为。黄老学说主张道法合一，德刑并重，在西汉文景时期曾一度是官方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。随后，由淮南王刘安集合一批门客编纂的《淮南子》，其中所强调的精神内守的养生之道、静默恬澹的修养法则、因势利导的治国之法、利民为本的行政思路、重德求仁的人际关怀等，是对黄老学说的系统概括。

汉武帝的独尊儒术，并不是完全禁止其他诸子学说。汉儒能够兼容他说，融合前代诸子的学说，作为自己理论的依据和思想的参照，不再强调自己立足于一家一派，而是注重让论述能够超越前人，后来居上。如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就把儒家学说和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，提出天人感应说，对两汉的学术和行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类似的还有扬雄的《法言》《太玄》，刘向的《新序》《说苑》，桓宽的《盐铁论》，王充的《论衡》，王符的《潜夫论》，荀悦的《申鉴》等。

魏晋子学以玄学为要，主要是儒、道的融合与会通。魏晋玄学立足于名实之辨，通过对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等经典的阐释，假经典立新义，以阐释求创作，建立起新的学术体系。何晏注《庄子》，王弼注《周易》《道德经》，向秀、郭象注《庄子》，都是通过注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，援儒入道，儒道兼取，摒弃汉儒章句之学重训诂的传统，重视对义理的阐发，试图从诸子的相同性、相通性的角度进行讨论，以寻求儒、道二者在学理上的互补。

南北朝子学并不发达，能被后世注意的著述主要有两部：一是梁元帝萧绎编撰的《金楼子》，萧绎看不起吕不韦、刘安集合门客编著的做法，从青年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搜集材料，亲自撰写《金楼子》，全书以崇儒为根本，以弘佛为援引，以尚道为旨归，体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。二是北齐刘昼的《刘子》，他兼采儒道，辨析诸多学术问题，其中《九流》篇对诸子九流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归类阐释，并将其学说的优劣放在更长的时段内进行反思，较为完善地梳理了诸子主要派别的演进线索，认为诸子“然皆同其妙理，俱会治道，迹虽有殊，归趣无异”^①，其中“道者，玄化为本；儒者，德化为宗”^②，是诸子之学的根本。他认为君当以民为心，法需因时而变；又阐明名实并秀、言理兼得、利害转化、美丑相对，能够采用较为灵活的思理观察问题，主张既要清心寡欲，又要重视善学诚信，体现出儒道融合、诸子兼容的特点。这两本书一南一北，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学术融合的趋势，可以看作南北朝子学发展的代表作。

隋唐子学的突出特点有二：一是仍以儒家学说为主干，如韩愈推崇孟子的圣人说，并继承董仲舒的思想；李翱发扬思孟学派的学说，作《复性书》专门讨论“性”；刘禹锡和柳宗元从更为理性的角度讨论天人关系，基本可以看作子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总结。二是继续南北朝以来“三教合一”的思路，在五代时期成书的《无能子》中，既有儒家的仁义道德，也有道家的坐忘修炼，还有佛教的无心之说，已经将三教贯通。

^{①②} 傅亚庶：《刘子校释·九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521页。

宋明子学分理学与心学两条支脉，前者以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为代表，后者以陆九渊、王阳明为代表。宋明理学讨论的问题较为集中，一是理气论，主要从宇宙论的角度讨论理的来源。周敦颐引入无极和太极两个概念，并与动静、善恶、性命等互为联系；朱熹提出理气同体，理一分殊。气是物质、载体，理是精神、内核，气中有理，理在气中，所以由气生成的万物，都涵盖了天地之哲理。二是心性论，主要发挥《中庸》的发明本心之说。张载强调通过道德的锤炼，将“自诚明”与“自明诚”建立起来；通过礼乐的约束，让人的心性合于天道。二程强调穷理尽性，认为天理就是性；朱熹又将性分为天理和气质，将人心分为道心和人心，通过心的修炼来让性合于天道，让人心合于道心，让修养合于天理。陆九渊吸收了禅宗的方法论，直指本心，从内心来反观万物，以“求放心”来养心性。而王阳明则将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结合起来，贯通了天理、内心、性情三者。

清中叶之前的子学，更多的是对前代子书的考订掇辑。尤其是乾嘉学派在校订、训诂、考据的过程中，尽管在思想上的创见并不多，但不断推高子学地位，为诸子争得了为六经之羽翼的地位。直至清中叶以后，随着西方学术的输入，子学开始逐渐向现代转型。如方以智、魏源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，吸收西学中的科学意识和怀疑精神，以西学阐释子学，以子学比附、会通西学。如用现代物理学阐释格物致知说，将老庄与民主、自由相比附，将仁爱、兼爱与博爱会通，其中尽管有牵强附会之处，但却开启了现代子学研究的新思路。

第二节 诸子的学理

诸子之所以能够分派，正在于其学说的不同，我们按照传统的分类，对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农家、医家、杂家、释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阴阳家进行简单的介绍。



慕课视频：
诸子如何分派

一、儒家

我们这里介绍的儒家，是孔子、孟子之后的儒家后学。按照传统的看法，儒家出自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。”儒家学说形成之初，便重视仁义礼乐，立身行己。这些观念在孔子时得到整理，由孟子继续阐释，至荀子得以大成。因孔孟之书被列入经部，子部中的儒家典籍，多以《荀子》为始。

谭嗣同曾说：“二千年来之学，荀学也。”^① 在于荀子将儒家的“礼”与法家的

^① [清]谭嗣同：《仁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47页。

“法”结合起来，出入于学术与政治之间，在修正原始儒家思想的基础上，形成外儒内法、德主刑辅的治国学说，成为后世儒家学说的主流。尽管汉儒之后多宗孔孟之道，但实际上更多延续荀子的礼法、刑德之说：其一，孟子强调性善论，荀子强调性恶论，并认为可以通过化性起伪来改变。其二，荀子把孟子所讲的“仁政”和“义”发展为礼和法，一方面强调礼乐，明分使群以礼，合同上下以乐；另一方面约以刑罚为法，即用刑罚来保障礼的实行。其三，荀子认为天人关系是相参相用，天有天的运行规律，人有人的活动规律，但可以“制天命而用之”^①。其四，荀子所论的名实，名是名称，实是事物的本质，二者不能相互混淆，要以实定名。

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和扬雄。董仲舒（前 179—前 104）是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，作《春秋繁露》阐释其学说。他的学术主张，一是强调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在思想上完成统一，独尊儒术是统一思想的最好办法，这便推动了儒学成为官方的主导学说。二是以天人感应解释君权天授，明确了汉王室得天下的合理性，并通过讨论天人互动的关系限制皇帝的行为，鼓励君主以德治国。

扬雄（前 53—18），仿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，仿《论语》作《法言》，他试图按照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路，重新建构起一套解释彼此关系的学理系统，以替代《周易》，并通过《论语》的解读来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。他的学说非常精湛深奥，在当时很少有知己。东汉桓谭认为扬雄的所思所想非常有价值：“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，而论不诡于圣人，若使遭遇时君，更阅贤知，为所称善，则必度越诸子矣。”^②认为他继承了原始儒学不务虚妄、专注学理的传统。唐代韩愈将扬雄推崇为与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等人并列的儒学大师，视为儒家道统中的重要一环。

儒学到了宋代又有一大转变，即在吸收其他诸子思想的基础上，兼采道教、佛教的方法论，形成了理学与心学。相比于汉儒重名物训诂，宋儒更重视阐释义理，流派分支甚多，远远超过之前的所有儒家，学说差异很大。例如张载以气论见长；程颐、程颢以论理见长；胡宏以论性见长。各派儒家学者聚集门人讲学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，相互争辩，使得儒学天命、心性、情理的讨论日渐深入。

二、兵家

兵家著述以军事实践的记录和军事经验总结为主要内容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单独为兵家列“兵书略”，著录兵书 53 家、790 篇、图 43 卷。主要原因是兵书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，单独列为一类。

任宏将兵家分为兵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四家。兵权谋家，强调通过运筹谋划，着力讨论如何通过外交、朝政、后勤、组织等手段形成综合实力，在战略层面形成军事优势。兵形势主要是从战术层面分析如何运用奇正、虚实、众寡、进退等方式，示形于敌，形成局部优势，取得战略战术的胜利。兵阴阳是试图利用

^① [清]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·天论》，第 317 页。

^② 《汉书》卷 87 下《扬雄传下》，第 3585 页。

天文、地理等客观条件辅助作战，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。兵技巧主要是有关军队作战的一些兵器、物资、卫生等方面的制作技巧和训练方法。

到了宋代，兵学文献分为兵书、军律、边策、营阵、阴阳五种。兵书主要是前代留下来的军事著作，军律是军队的律令法规，边策是国防建设的对策与思路，营阵是讲军队安营扎寨、设置阵法的方式，兵阴阳是根据客观条件对军事行动进行判断、预测。这五类是适应后世将军事行为视为国家行为而采取的新分类。

兵家的代表著作是“武经七书”，即《孙子兵法》《吴子兵法》《六韬》《司马法》《三略》《尉缭子》《李卫公问对》七部著名兵书。经北宋以官书颁行，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。

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兵学最为经典的著作，明代兵学家茅元仪在《武备志·兵诀评》中说：“前孙子者，孙子不遗。后孙子者，不能遗孙子。”说的正是《孙子兵法》在古代兵学中的基础性地位。《孙子兵法》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之道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行动之法、奇正相生的攻守之宜、注重道天地将法的选将之理，概括了古代军事领域用兵选将、判断成败的基本经验。

吴起（前 440—前 381）与孙武（前 545—前 470）并称孙吴，他居魏二十七年，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成为春秋时期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。《吴子兵法》是他作战经验的总结，强调以内修文德、外治武备来自强，以审敌虚实来应变，以刚柔并济来带兵，以赏罚严明来管理，以灵活多变来取胜。如果说不战屈人是决策思路，文武兼备则是战略基础，《孙子兵法》强调谋略取胜，《吴子兵法》讲究的是以战术取胜。

《六韬》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，司马迁将之誉为兵家权谋类的始祖。全书以《文韬》论用人之道，以《武韬》论用兵之法，以《龙韬》论军事组织，以《虎韬》论排兵布阵，以《豹韬》论战术运用，以《犬韬》论作战指挥。《六韬》说的是如何把周朝做大做强，打败处于控制地位的商朝，其实这本书是战国人重新编订而成的，但其中的思路与策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。

《司马法》最初是汇集军法、军礼、军事条例、条令等典章制度的著作，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，其中保留有虞氏与夏、殷、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、武力使用、军事赏罚、兵器的配备和战车、旌旗、徽章等制度，在秦汉时期流行较广。内容多记录先秦步战、车战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方式，与汉代之后的作战环境不相符合，因而逐渐散佚，至北宋整理时只剩下五篇。

《三略》专论战略，一是强调以民为本、以兵为用，国家要想取胜，就要通志于众，收揽英雄之心，军队上下同心；二是慎兵慎战，战争不得已而用之，且要以义诛不义；三是取胜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，富强国家，才有持续不竭的战争动员能力。

《尉缭子》主要讨论了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的关系，强调军事行动要依靠人力，而不能依赖鬼神，支持挟义而战的军事行动，认为军队应有严明的纪律、完善的奖惩制度，形成完备的组织形式、指挥系统和行军序列，强化平时训练，才能保证战时取胜。

《李卫公问对》联系唐朝以前的战例，结合唐太宗与李靖本人的作战经验，融通前代兵家言论，就奇正、虚实、主客、攻守、形势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讨论，结合汉唐之间的用兵经验，对前代兵书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，是唐代兵学的代表著作。

宋代将此前的兵书进行了汇总，编成《武经总要》，对选将料兵、教育训练、军事通讯、水陆战法、军事地理、武器装备、战例得失、阴阳占候等进行分类叙述。明代继续编订《百战奇略》《武备志》等书，从不同角度对历代战例、军事制度等进行了分析，带有明显的总结性质。

三、法家

法家的学理经李悝、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、韩非子的阐释之后，已经成型。秦汉之后的法家，基本上遵循两条路径发展：一是着力制定律令，从秦朝就开始制定统一的《秦律》，其中有对田制、商业、徭役等的规定；汉代有萧何所定《九章律》，叔孙通所定《傍章律》，张汤所定《越宫律》，赵禹所定《朝律》，合称为“汉律”；唐代有历史上最完整的法典《唐律》和《唐律疏议》，宋代有《宋刑统》，明代有《大明律》，清代有《大清律例》等。与之相关的讨论，也是关注于司法实践和律令制定。二是变法革新，如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主张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，推行庆历新政；宋神宗倚重王安石，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角度推广新法。此后法家学理上的新创并不是很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将《管子》由道家移到法家。管子是春秋初年齐人，曾辅佐齐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^①，在时间上比商鞅、申不害等都早。但《管子》这本书不是管仲一人所作，其中虽有管仲的言论，但更多是稷下学宫学者们的论述，融合着道、法、儒、名、兵、农、阴阳、轻重等百家之学。《管子》更多强调礼法兼重、道法合流，与礼并重，治国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国富民，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民为本。将《管子》移入法家，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对待法家的态度，更注重将法作为治国理念之一，与礼乐、经济、武备、政治相辅相成。

四、农家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概括农家的特点在于“播百谷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”，其著述中多是五谷种植、农耕之法和任地生产之类的讨论。《管子》的《地员》《度地》，《吕氏春秋》的《上农》《任地》中有类似的讨论，应该视为农家思想的遗留。

在先秦，重农是诸子共同关注的问题，如老子崇尚小国寡民的自然农业，儒家推崇“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”^②，墨家具体实践着耕稼树艺，法家更是重农轻商，富民以农。许行是先秦农家代表人物之一，他与门徒“有为神农之言”^③，从具体的食货之事出发，主张亲自劳动、平等劳动、分工互给、物物等量交换，保留着以农为

① 《史记》卷32《齐太公世家》，第1491页。

② 《论语注疏·宪问》，第207页。

③ 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章句上》，第170页。

本、务农立国的传统。

汉代之后，农家侧重记述农业生产的方法：一是强调顺天之时，如氾胜之《氾胜之书》、崔寔《四民月令》等，阐述农业生产与二十四节气、七十二候的对应关系，侧重讨论农时。二是主张因地制宜，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分析了季节、气候、土壤与农作物的关系，提倡精耕细作、防旱保墒，记述了轮作之法，讨论了如何多施绿肥保护地力，如何采用扦插、嫁接之法育苗，培育优良品种等。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，侧重讨论土地开垦和水利措施，其中讨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棉花种植经验，总结为“精拣核、早下种、深根、短干、稀科、肥壅”十四字诀。三是总结救荒济时的经验，如明代编写的《救荒本草》，搜集历代本草中所记载的 414 种可供人食用的草、木、米谷、果、菜，按部编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五、医家

在夏商周时期，医家和巫师密不可分，既承担着交通鬼神的职能，又能兼及治病救人，也被称为巫医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医家与巫师开始分途发展，医学理论也在此时萌芽，经过秦汉的完善，形成了托名黄帝的《黄帝内经》，讨论了精气学说、阴阳五行学说、气血津液、藏象、经络、体质、病因、发病、病机、治则、养生等内容，确立了中国医学的理论体系。

中国医学把人体看作一个与自然界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，以脏腑和经络为中心，强调天人相应和阴阳平衡，把人的五脏、六腑、五官、形体等，都按照五行的属性归类，利用相生相克的原理，结合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等要素进行判断，从而确定治疗的方向。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就是天人不和谐导致阴阳失调的结果，外因在于风寒暑湿燥火，内因在于喜怒忧思悲惧，内因和外因相互影响，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协调的状态，是为病征。因此要结合不同的病征、时令、个体差异、年龄差异，采用不同的治疗措施，这就是“辨证施治”，辨别不同的症候并研究其致病原因。有时候是“同病异治”，比如都是出麻疹，但对初期麻疹未出透与对末期麻疹退余热，治疗的方法截然不同；同样是感冒，也要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。有时候是“异病同治”，如心律失常、闭经均可能导致血瘀，所开的药方便有相近之处。

中医的用药多采于自然，有些经过加工。中药的药理来自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该书共收载药物 360 种，对每种药物的别名、生长环境、性味、功用等都做了详细叙述，并根据养命、养性、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中药药物集大成的著作是《本草纲目》，共收载 1892 种药物，附图 1000 多幅，药方 11000 多个，不但对药物从释名、集解、修治、气味、主治等方面做了详细描述，还记载了人体病理、疾病症状、疾病预防的诸多经验。

中医认为经络是运行气血，联络脏腑、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，由任脉、督脉、手太阴肺经、手少阴心经、手厥阴心包经、手阳明大肠经、手太阳小肠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足阳明胃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足少阳胆经、足太阴脾经、足少阴肾经、足厥阴肝经十四经脉组成，可以应用于解释病理变化、协助疾病诊断，因而对经络进行观察、调理、刺激，既可以辅助诊断，也能辅助治疗，这便形成了脉诊理论和针

灸实践。《难经》《脉经》《针灸大成》对经络学说有着详细的解读。

明清之后，随着西医的引入，中医受到较大的冲击，很多理论被视为是落后的、不科学的，这未免太过片面。中医既然能流传数千年，其中应有它的合理之处。我们应该吸取中医的精华，并吸收借鉴西医的优势，取长补短、融会贯通，实现中医的现代化和科学化。

六、杂家

杂家是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收录内容最多的一类。所谓的“杂”，意指包罗万象，把当时不能具体划分的诸子著作统统列入，并分杂学、杂考、杂说、杂品、杂纂、杂编之属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认为：“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。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”杂家兼容百家之长，融会贯通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说：“杂者，兼儒、墨之道，通众家之意，以见王者之化，无所不冠者也。”认为杂家兼通诸家，融通百家学说，服务于现实需求。但在实际编目中，常常是将无法归类的书列入杂家。《四库全书》中，便将不再单独分类的墨家、名家、纵横家等归入，如《墨子》《尹文子》《公孙龙子》《鬼谷子》《慎子》《鬻子》等被视为杂家。

杂家的代表著作是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。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共同编撰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共160篇。“十二纪”按四季分类，以十二月令为线索；“八览”从开天辟地说到做人、务本之法，治国之道；“六论”兼取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兵、纵横、阴阳等各家学说，意在为秦国的集权制度统一思想，建立理论根据。《吕氏春秋》广收诸子之言，初步形成了一个条理明晰、体系完备的学理系统。

西汉淮南王刘安与其宾客共同编成的《淮南子》，原名《淮南鸿烈》，“鸿”是广大之意，“烈”是光明之意。刘安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之意，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，为汉代的治国法典，“作为《内书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甚众，又有《中篇》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”^①，但现存的《淮南子》只是其《内篇》21篇，大旨归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，但糅合各家学说，涉及宇宙学说、天文地理、人性论、道德论、政治论、军事论等多方面，要比《吕氏春秋》融通得多。

七、释家

释家即佛家。佛教是由佛、法、僧三者综合构成的宗教实体，三者合称三宝。其中的法，即佛教的各种教义和学说，主要是戒、定、慧三学。戒指戒律，是防止人们作恶业的规则；定指禅定，修持者思虑集中，参悟佛理的学理；慧指智，是可以让修持者获得解脱的方法。

在佛教的宇宙观中，宇是时间，宙是空间。佛学认为时间分为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三际之间互为因缘，相互促进，无穷无尽。过去因缘由无明（痴）和行（行为）

^① 《汉书》卷44《淮南衡山济北王传》，第2145页。

组成，会生成现在因缘，现在因缘也会产生未来的苦果。也就是生和死。作为个体来讲，最终结果要么是生，要么是死，而对人类整体而言，生和死是随时随地的结果。人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正处在无明、行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十二种因果关系中，又循环不断。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来讲，都是双重因缘，既是过去原因的结果，又是未来结果的原因。

佛教讲的空间有十方，任何一方都生了另一方，一方与另一方之间互为因缘。这个空间外还有一个空间，那个空间外还存有另一个空间，无穷往外延伸，推之无尽。从广度上看，空间建构的中心是一个小世界，一千个小世界形成了大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大千世界形成了中千世界；一千个中千世界形成了大千世界，这一世界是无穷和向外延伸的。从高度上看，天有二十八层，分为三界，即三界二十八层天：最下层是欲界六欲天，主要是饮食、男女、睡眠三类六大欲望所形成并决定的；其上是色界十八层天，在色界里没有欲望，只有形状和身体；再上是四层天，即无色界。无色界彻底摆脱了欲望和形体，只剩下纯粹的精神，基本达到了佛的境界，进入大明境界。

佛教的人生观，是从受想行识、三苦、八苦中推导出的人生皆苦。从空间上说，三界统苦，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世界，一切都是痛苦的。从时间上说，这些苦是无穷之苦，无论何时何地人，都是在痛苦之中。很多人想解决痛苦，但不得法，结果是舍本求末，解苦复造苦因，缘木求鱼，增苦无有止时。因为没有悟到万法皆空，没有悟到万法因缘生。只领悟痛苦来自因缘，自然不能斩断因缘；只有斩断因缘，才能消除痛苦。

佛教的认识论，是空、假、中三者合成的“三谛”。真正有智慧的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常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同时思考。用其一而想到其他两个方面，彼此圆融无碍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如观空时，无假无中无不空；观假时，无空无中无不假；观中时，无空无假无不中，这种方法被称为“圆融三谛”。

佛教是外来宗教，佛教哲学多是出于对原始佛典的翻译和格义。格义是用古代传统的观点与佛教中的思想比拟配合，使人易于了解佛教思想的方法。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，许多西域僧人来到中国，如安息的安世高、安玄，月氏的支娄迦讖、支曜，天竺的竺佛朔、鸠摩罗什，康居的康孟详，他们翻译了《安般守意经》《首楞严三昧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正法华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《摩诃止观》等，大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已经传入。同时佛经开始结集，编纂成目，便有了佛典。从西晋荀勖《中经新簿》开始收录佛经，到南朝齐阮孝绪作《七录》，以《佛法录》为外篇第一，内分戒律、禅定智慧、疑似、论记五类，至隋释法经编《众经目录》，分经、律、论，大乘、小乘各列一录；其他的则分抄集、传记、著述三集编目。自此，佛典的编撰有了一定的规范。

后世最著名的佛经，即《大藏经》，也称“一切经”，是汇集佛教一切经成为一部全书的总称。唐代释智升曾编撰《开元释教录》，用《千字文》编号，自“天”字至“英”字，共四百八十字，每字一帙，合四百八十函，每帙收佛经十卷左右，共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 5048 卷，这是后世《大藏经》的蓝本。此后历代刻藏，修订增益，相沿不改，前后共有二十多种刻本问世，历经清代雍正、乾隆两朝的官刻，

集历代刊刻之大成，共达 5600 多万字，收录 724 函 1669 部，7168 卷。

八、道家

道家收集的多是道教的典籍。中国的道教在汉魏时期开始形成。张鲁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，夺取汉中，推行五斗米道，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，同时将老子神圣化，不仅使老子成为神仙和教主，而且使《道德经》成为宗教的思想资源。到南北朝时，又由葛洪、陶弘景总结了炼丹学说和修炼之法。至唐宋，道家继续发展，理论建构也日趋完善，用神仙思想来阐发老庄，推行心性修炼，逐步形成了道家“性命双修”的核心理念。

道教的思想体系由玄道思想、仙道学说构成。玄道思想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根本。玄是万物本原的状态，混沌一体；道是生化宇宙万物的原动力，是造化之根。天地万物之所以运行，靠的是道的驱动；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，靠的是道的衍生。因此道是生命之本，是最伟大的德行，以虚无为体、清静为宗、柔弱为用，无为不争。道教以“道”名教，正在于他们对玄道的推崇和对道的敬仰。

仙道学说主要描述人何以合道成仙。早期的道家学说以神仙思想作为超越世俗的精神动力，仙人体现了道的特质而超越世俗，人如果通过自我修行而体认道，便可达到长生久视。所以，道教一方面以贵生、重生、乐生、生道合一为得道方式；另一方面也讲要想实现长生，关键要合于清静自然之道，让内心与天地结合起来，让行为和宇宙之道结合起来，用道来保养肉体，以达到长生的目的。

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，主要收录的是道教典籍，或者说，道家和道教的文献被混为一谈。但由于道教在明清已逐渐衰微，又受到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压制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对道教典籍的收集并不十分全面。其实在明成祖时，曾令张宇初编撰《正统道藏》，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典。《正统道藏》共 5305 卷，480 函，按三洞、四辅、十二类分类，采用《千字文》为函目，自“天”字至“英”字，每函各为若干卷，颁行天下。后在明神宗时又续补过，仍以《千字文》为函次，自“杜”字号至“纓”字号，凡 32 函，180 卷，名《万历续道藏》。这两部是现今仅存的官修道藏，文献意义极为重大。

九、墨家

墨家以兼爱、非攻为政治学说。兼爱就是兼相爱，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博爱。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，其根源在于彼此不能相爱。从人际的角度来说，人与人之间要交相为利；从国际的角度来说，诸侯之间应禁止征伐，因为战争不利于百姓生产，也不利于诸侯和睦。

墨家以尚同、尚贤为其政治学说。《墨子·尚同上》说：“上之所是必皆是之，所非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”尚同就是上下同心，团结一致。治世需用贤人，而贤人多出自民间，所以应该从民间擢拔人才。

墨家以天志、明鬼、非命为宗教思想。墨子相信天是一个有意志的存在，也是

一个至上神。他认为社会的运行和人类社会的建构需要顺应天意，因此彼此之间应讲究兼爱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只有这样上天才会奖赏人类，使一切风调雨顺。如果人类的行为违背了天意，则必然会受到上天的惩罚。天能够监督君臣、百姓执行其意志。为了说明天可以监督君臣百姓，墨家又提出了明鬼说，即认为有鬼神时刻在监督着他们。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类似宗教的学说体系，试图用天帝、鬼神的监督使人间的善恶得以贯彻。

墨家以节用、节葬、非乐为经济学说。墨子立足于下层老百姓的利益，看到的是货物有穷，而耗费无尽，因此提倡勤俭持家。而春秋时期，厚葬成风。厚葬是把可供活人使用的财物理在地下，这就造成了客观的浪费。故而墨子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提出要节葬、节用。

墨家以“三表法”建立逻辑体系：“于何本之？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。于何原之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。于何用之？废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”^①在讨论问题时，应该先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历史渊源，再看是否适用，并观察其对老百姓是否有利。除此之外，墨子还建立了一套逻辑体系，被称为“墨辩逻辑”。他在“墨经”、《大取》《小取》中专门讨论，如把名分为达名、类名和私名等。

墨子曾经带着自己的门徒东奔西走，到处游说以缓解战争，建立起严密的组织。墨子死后，由矩子继续领导该组织。这样一来，墨家既是一个学术团体，又是一个带有侠义思想的民间组织。墨家学派到秦汉以后衰亡，原因很多。一是过于刻苦，不符合常人的生活。墨子摩顶放踵，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其继承者很难有这样的觉悟和毅力，难以为继。二是陈义过高，难以实行。墨家的十大学说太过于完美，几代人实现不了，就难免对其产生怀疑。三是组织严密。无论到哪国做官的墨者，都必须坚守墨家的主张，若行不通时，宁可辞职。这种超脱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管理形态，在秦汉时期便不可避免地遭到禁绝。

十、名家

名家是先秦专门研究名理问题的学派，代表人物为邓析、尹文、惠施、公孙龙。在当时，讨论名实并不是名家的专利，而是诸子普遍关注的话题。墨子的经说、荀子的名实论、惠施与庄子的辩论等，都是对这些逻辑问题的思考。宰我、子贡、苏秦、张仪、邹衍、邹奭、田骈、淳于髡等善于辩说，都受到了名辩思潮的影响。名家思考的是认识方法、逻辑关系和表达策略。可以说，名家关注的是道如何阐释，而不再是道的本身。

名家之祖是邓析（前 545—前 501），他最早提出了形名之辨、循名责实，反对“无厚”之论，^②开名辩思潮的先河。邓析在政治上是在朝的反对派，在民间是著名

^① [清]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·非命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266页。

^② 《邓析子·无厚》：“天于人无厚也，君子于民无厚也，父于子无厚也，兄于弟无厚也。何以言之？天不能屏勃厉之气，全天折之人，使为善之民必寿，此于民无厚也。凡民有穿窬为盗者，有诈伪相迷者，此皆生于不足，起于贫穷，而君必执法诛之，此于民无厚也。尧舜位为天子，而丹朱商均布衣，此于子无厚也。周公诛管蔡，此于弟无厚也。推此言之，何厚之有？”王恺鏊：《邓析子校正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，第1页。

的讼师，专门用法律的条文来辩护打官司，搞得郑国人“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，所欲胜因胜，所欲罪因罪，郑国大乱，民口灌谗”^①，于是大夫子产就把邓析杀了。

尹文（约前 360—前 280）也是早期的名家学者，他所探讨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点：

第一，论名有三科。尹文认为名有三类：一是命物之名，如方圆白黑之类；二是毁誉之名，如善恶贵贱之类；三是况谓之名，如贤愚恶憎之类。

第二，论法有四呈。一是不变之法，如君臣上下之类，是对社会关系的分析；二是齐俗之法，如能鄙同异之类，是对社会现象的概括；三是治众之法，如废赏刑罚之类，是对行政行为进行总结；四是平准之法，如律度量量，是对规则秩序进行描述。他的这些总结多停留在命名、概括的阶段，说明这时的名家还处在逻辑思考的初期阶段。而到了战国中后期，名家学说迅速发展，遂形成了重要的两派：合同异和离坚白。

合同异以惠施为代表。现留存于世的惠施学说，只有《庄子·天下》所记述的“历物十事”和“辩者二十一事”。^②从整体上看，惠施认为天下的东西都是相同的，与庄子的齐物论相类似，实际上泯灭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差异。但庄子的齐物论是建立在对道的认识之上的，是一种思想的认同。而惠施的“合同异”则是建立在逻辑表述之上的，是方法推导的一种结果，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中寻找其相同点，在差异性中寻求其相似性，忽略事物的个性，而重视其共性。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·明见篇》中把惠施的观点分为三组：一是认为惠施所说的空间并不是实有的空间，而是理论的空间；二是认为惠施所说的时间也并不是实有的时间，而是理论的时间；三是意识到实有的空间、时间的差异是存在的，而理论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同异，不是绝对存在的。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里则分为两组：一是讨论一切空间、时间的区别都非实有，只是理论上的存在；二是论一切差异都不是绝对的，从自相来看，万物毕异；从共相来看，万物毕同。除此之外，惠施还总结逻辑知识，如“飞鸟之景未尝动也”^③，我们觉得飞鸟一掠而过，但鸟影和鸟间没有变化；讨论名实关系，如“黄马骊牛三”^④，黄马骊牛是三样事物，马是一个，牛是一个，黄和骊是形容毛色，这样实际上就是三样事物。

离坚白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，其与“合同异”的指向正好相反，侧重讨论事

① 许维通：《吕氏春秋集释·审应览·离谓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488页。

② “历物十事”：（1）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；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（2）无厚，不可积也，其大千里。（3）天与地卑，山与泽平。（4）日方中方睨，物方生方死。（5）大同与小同异，此之谓小同异；万物毕同毕异，此之谓大同异。（6）南方无穷而有穷。（7）今日适越而昔来。（8）连环可解也。（9）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。（10）泛爱万物，天地一体也。“辩者二十一事”：卵有毛；鸡三足；郢有天下；犬可以为羊；马有卵；丁子有尾；火不热；山出口；轮不辗地；目不见；指不至、至不绝；龟长于蛇；矩不方、规不可以为圆；凿不围枘；飞鸟之景未尝动也；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；狗非犬；黄马骊牛三；白狗黑；孤驹未尝有母；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。〔清〕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·天下》，第1102—1106页。

③④ 〔清〕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·天下》，第1106页。

物的绝对性，即认为天下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同的。如坚石和白石不能被看作一个东西，坚描述的是硬度，只有摸了才知道它为坚。白是颜色，只有看了才知道它为白。也就是说，一块石块不能同时见到坚和白，所以只能选取其中任何一个感觉与石合为一物。再如“白马非马”，其理由有：第一，马是一个类的概念，白马只是类中的一部分，故白马不能等同于马。在这里，白马是殊相，而马是共相，白马只是马的一个特点，不能概括出马的全部。第二，马只是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着，而白马则是实在的。第三，白马是有专色指称的，而马则可以指称任何色的马。

名家在先秦虽然名噪一时，但却是诸子中最早衰落的一个学派，书籍流传后世的也最少。根本原因在于时势不同，春秋战国是标新立异、鼓励一反成见的时代，勇于挑战常识的名家得到推崇。但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，思想的钳制迅速压缩了名家善于怀疑、否定的空间，再加上名家的许多逻辑被其他学派所吸收，名家失去作用，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。

十一、阴阳家

“阴阳”的概念最早见于《周易》，“五行”的概念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这两种观念的产生，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巫术与方技。到战国时代，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，阴阳家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。

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邹衍（约前 324—前 250）。他喜欢谈论天文变化的始终，便得到了一个绰号叫“谈天衍”。他早年学习儒学，看到那些儒墨的后学不知道天地广阔，而只能立足于一点来谈论治道：“将一曲而欲道九折，守一隅而欲知万方，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，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。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，以喻王公，先列中国名山通谷，以至海外。”^①他以阴阳消息论怪迂之变，并作《终始》《大圣》等十余万言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著录有《邹子》49篇，《邹子终始》56篇，可是都亡佚了。

邹衍的学说主要有“五德始终说”和“大小九州说”。“五德始终说”的主旨是以天文论天人的关系，以五行论人事的变化，以地理论万物的消长。邹衍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而成的，朝代的更替也是如此。按照这一学说推论，尧属土，夏属木，商属金，周属火，秦属水，汉属土。木克土，夏代尧；金克木，商代夏；火克金，周代商；水克火，秦代周；土克水，汉代秦。用五德生克的学理解释历史演进，形成了五德终始说，对中国政治学说的影响很大。

“大小九州说”是邹衍对宇宙空间的一种假设。他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，只占天下的 1/81。中国只是赤县神州，赤县神州内有九州，为禹所分：即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，这是小九州。神州之外还有九个州，其为海所环绕，每州内又各有九州，且语言风俗各不相通。这是大九州。这种假设

^① 王利器：《盐铁论校注·论邹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551页。

不仅开阔了战国时期学者们的视野，促成了《山海经》等书的编纂，也为汉魏时期博物类小说的编纂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。

阴阳学说在古代非常盛行，其优点在于通过对日月星辰、物候的观察，可以制定节历，有助于社会生产。但是过分地探求其中的一些所谓的禁忌、术数、吉凶，就难免使人事处于被动。如《太平经》中的神化、《老子想尔注》的仙化，这种“舍人事而任鬼神”^①的做法，实为过分地相信天意，以星占术、堪舆术、占梦术、相术、命术等推演人的生老病死、吉凶祸福，把人后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放弃了。阴阳之说的虚妄与附会，仅从这些书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

第三节 子部文献的阅读

由于子部文献众多，我们介绍一下子部文献的阅读方法，并从《四库全书》中子部的天文算法、术数、艺术、谱录、类书中，选取八种常见的典籍加以介绍。

一、子部文献阅读法

阅读子部文献有两条路径，一是从目录学入手，既能从宏观上把握，又能从微观上分析，可以清楚梳理出文献的发展脉络；二是从哲学思想入手，可以掌握学术史的发展演变，了解思想演变的过程。具体来说，可以从以下四点来把握：

第一，明源流支脉。但凡学术的发展都有源有流，源头皆可以追溯，而支脉则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情况。如墨家、纵横家、名家学说在先秦是主流，后来则成为末流。而当时与之地位相当的儒家，则成为之后几千年的主流。我们阅读子部文献，要能依据学术的发展，明晰这本书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定位，才能够真正地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。

第二，察学理融通。学理的差别多是相对而言的，若合而言之，又有许多相通之处。如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，我们有时候认为它们的差别非常大，一度水火不容，孔孟对墨家持排斥态度，《墨子》中还专门写了一篇《非儒》。据此我们可以分析“仁”和“兼爱”的差别，仁是有差别的爱，兼爱是无差别的爱。正因为兼爱是没有差别的爱，所以儒家训斥墨家无君无父、无异禽兽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其中的理路也有相似之处，“仁”和“兼爱”都是提倡人对外在社会关系的处理，二者代表了先秦学者对人之为人的思考。我们阅读子书，要注意到诸子与相邻学说之间的融通关系。一家学说越开放，对相邻学说融通得越多，这家学说也就能后来居上，儒家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，并非认为儒家是

^① 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第1735页。

诸子中最高明的，一是看中了儒家的兼容并包，二是在于其学理适应汉代政治的需求。

第三，知学派开合。从文献角度来看，学派开合指的是诸子文献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分类。小而言之是在子部内的变化，如《管子》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道家被移动到《隋书·艺文志》中的法家；《墨子》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墨家被移动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的杂家，体现的是后世对子学的认知。大而言之是在四部之中的变化，如小说家原属于子部，有时也被列在史部里，这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待小说的不同态度。杂史也是如此，有些杂史被列在子部，有些杂史则列在史部。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二，一是有些文献内容庞杂，本就无法归类；二是不同时代的学术眼光不同，由此产生对文献的看法不同，划分标准也就有了差异。这种变动，正反映了不同学术时期的不同学术思想，为我们深入观察提供了文献学上的参照。

第四，通万物品庶。子部中的艺术和谱录类，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学理，多是经验和感悟，或者说是古人生活的写照和对雅趣的推崇，我们可以据此了解古人生活的许多侧面。如明代高濂写的《遵生八笺》，分为清修妙论、四时调摄、却病延年、起居安乐、饮馔服食、灵秘丹药、燕闲清赏、尘外遐举八笺，写了如何饮茶喝酒、如何写字画画、如何养生休闲，我们翻一翻，看一看，会发现原来古人的生活那么精致而有情调。

子部的内容素以丰富见长，我们不仅可以出于研究的需要去读，也可以出于兴趣去读，这样才不至于走入死读书、读死书的死胡同里。

二、子书举例

1. “算经十书”

“算经十书”是唐代国子监算学馆选取的十部数学著作，由李淳风整理并加以注释。这十部书分别是《周髀算经》《九章算术》《孙子算经》《五曹算经》《夏侯阳算经》《张丘建算经》《海岛算经》《五经算术》《缀术》《缉古算经》。

《周髀算经》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数学著作，也是天文学著作，以“盖天说”解释天象的运转。在数学方面则涉及分数乘除法、开平方、勾股定理；《九章算术》中提出负数的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则，还最早系统地叙述了分数运算；《孙子算经》中最著名的问题是“鸡兔同笼”；《张丘建算经》中有等级数、最大公约数、最小公约数的问题；《海岛算经》以测海岛的高和距离而得名；《五经算术》是对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、“三礼”“三传”、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中与数学有关的地方加以注释。

唐代“算经十书”中的《缀术》在唐宋之际失传，宋代刊刻的“算经十书”便以另一本《数术记遗》来替补。该书吸收了佛教思想，提出了无穷大与无穷小的概念，并进行解释。

2. 《法书要录》

《法书要录》十卷，唐张彦远撰。张彦远约出生于唐宪宗元和年间，到唐僖宗时

尚在人世。他是唐明皇时期宰相张嘉贞的玄孙，家中世藏书法名画甚富，尤精于书画鉴赏之学。《法书要录》是古代传世最早的书论专集，收录了东汉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各朝代有关名家书法的理论文章，如晋王羲之《论书》、晋卫夫人《笔阵图》、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唐张怀瓘《书断》等。而对其视为伪托者，如王羲之《教子敬笔论》，均在目录下俱注不录。从整体上看，《法书要录》采集资料极丰，选择校核亦精。唐代后此书广泛流传，使得许多已散佚的书法著作得以保存至今，成为后世书法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。

3.《历代名画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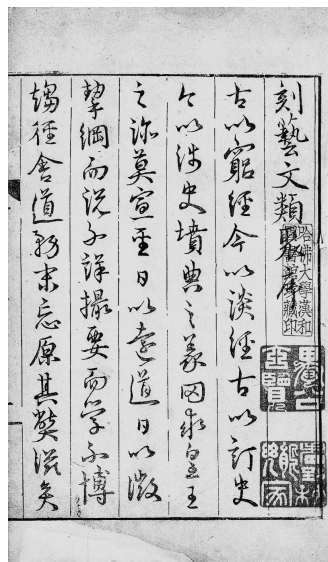
《历代名画记》十卷，唐张彦远撰，是现存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绘画通史专著，采用夹叙夹议、史论结合的方式，阐述张彦远个人的看法和见解。其中，前三卷的十五篇“叙”“论”，分篇论述了古代绘画的源流发展、兴衰历史，以及历代名画人名、理论技法、师承传授、绘画工具、书画价值、绘画鉴赏、书画款印、绘画装裱与寺观壁画等各方面。可谓是从画史、画法、画工、画鉴这四个方面，对中唐之前的绘画史做了系统的总结。在其中，张彦远新创“书画同体”论，继承发扬了谢赫的“六法”，无论对后来的绘画理论还是创作实践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后七卷为历代画家小传，述评自轩辕时至会昌元年 372 位画家的事迹和作品，对列入传记的画家，或一人一传，或父子师徒合传，按照自然、神、妙、精、谨细五个等级进行评价。这些都标志着古代绘画理论和画史著述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
4.《文房四谱》

《文房四谱》由北宋苏易简撰，分笔谱二卷，汇集各家造笔的经验和技术；砚谱一卷，叙述各地名砚制作工艺；纸谱一卷，介绍各种纸张的名目、加工、用途；墨谱一卷，记载名家造墨经验。不仅如此，苏易简还采纳有关典故、轶闻，并汇集有关赞咏诗词，比较完整系统地汇集了北宋以前有关文房四宝的历史，是科技史、文化史的重要文献。

5.《艺文类聚》

《艺文类聚》一百卷，唐欧阳询等编撰，是现存最早的官修类书，于唐高祖武德七年（624）成书。《艺文类聚》采集唐以前一千多种文献古籍，分门别类，摘录汇编而成，共一百多万字。全书分天地、岁时、山水、帝王、人、礼、乐、职官、治政、杂文、居处、衣冠、服饰等四十六部，下列七百二十七个子目。《艺文类聚》虽为抄纂之作，但在体例上别出心裁，改变了过去类书有事无文的缺点，将事文合璧。所谓“事”，是经、史、诸子典籍中记载的历史故事；所谓“文”，是历代诗文的描绘歌咏，欧阳询还按照不同的文体，用诗、赋、赞、箴、表等字标



明嘉靖天水胡纘宗刊本
《艺文类聚》书影

明类别。如“天部”的第一条，先列出关于“天”的各种传说、典故，如引用经部的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春秋繁露》，子部的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；然后罗列历代以“天”为题的诗赋文章，如屈原的《天问》、西晋成公绥的《天地赋》、南朝宋颜延之的《请立浑天仪表》，这就为后人写诗作文时稽古用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6.《初学记》

《初学记》是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为了便于诸皇子写作诗文时查找典故、检寻事类，而命徐坚、韦述等人编撰的一部类书，因内容便于初学者，故名为《初学记》。全书共三十卷，六十多万字。分为天、岁时、地、州郡、帝王、帝戚、职官、礼、乐、人、文、武、道释、居处、器物、果木、兽、鸟等二十三部，下分三百一十三项子目。

在每一子目下，又按“叙事”“事对”“诗文”三部分排列。“叙事”引用古书有关事物掌故的记载，对本目作概括叙述；“事对”选取古代故事或文句，提炼成对偶词句；“诗文”则辑录有关的诗文歌赋。如卷十七《人部上》的第一条“圣”，先引用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等书的原文，解释有关圣人的各个方面；再著录“虚心，正己”“穷神知化，尽妙体道”“备九德，综三纲”“禀四时，贯万物”“幽赞神明，弥纶天地”几个联句，引用古籍原文，注明出处，讲述与圣人有关的典故和故事；最后是摘录有关圣人的诗文歌赋，如东汉孔融的《圣人优劣论》、东晋湛方生的《孔公赞》、唐颜师古的《圣德颂》等。

7.《太平御览》

《太平御览》是宋代官修类书，李昉等撰。“太平”取自宋太宗赵炅的年号“太平兴国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初名《太平总类》，因宋太宗命每天进呈三卷，以备一天浏览，便改赐今名。

《太平御览》的编纂目的，是为帝王大臣提供治国理政的百科知识，以“……备天地万物之理，政教法度之原，理乱废兴之由，道德性命之奥”^①，因此规模更为宏大，共有一千卷，近五百万字，目录就有十卷。其引用北宋前的一千六百多种典籍，以天、地、人、事、物为序，分为五十五部，子目则多达五千三百六十三种。《太平御览》的每一子目，直接引用文献资料。每条引证都先标明书名，次录原文，按时代先后排列，并不加己见。如卷六百七《学部一》的“叙学”，摘取《论语》《大戴礼记》《淮南子》等书的原文，集中了对“学”的解释。《太平御览》所采多为经史百家之言，小说与杂说引用甚少，但内容充实，剪裁得当，读起来趣味盎然。

8.《永乐大典》

《永乐大典》初名《文献大成》，在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命解缙等人撰修而成，其规模远超过前代编撰的任何类书。《永乐大典》辑录上自先秦，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籍，内容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以及道藏、释藏、戏曲、平话、工农技艺、奇

^① [宋]蒲叔献：《太平御览序》，引自《太平御览》，第1页。

闻异事等。全书共 3.7 亿字、22877 卷，另加目录 60 卷，装订成 11095 册。

《永乐大典》按《洪武正韵》的韵目编排，“用韵以统字，用字以系事”，每一韵下列单字，每一字下分列与之有关的各类内容，保存了明以前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。因为该书卷帙浩繁，当时无法刻版刊印，只书写了一部，明嘉靖年间曾另摹副本一部。可惜的是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，副本则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部分被毁，部分被劫，部分流散于民间，有些流散至海外。目前《永乐大典》的残本散落在英、德、美、日等地，共计 380 余册，还不足整本书的 4%。

思考题

1. 诸子百家中，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家？谈谈它是如何建构起学理系统的。
2. 谈谈“外儒内法”是如何形成的。
3. “儒道互补”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请结合他们的学说进行论述。
4. 如何看待“百家争鸣”与“天下殊途同归”？